

林杉
著

文心雕龍批評篇新詮

郭頌輝題



内蒙古教育出版社

卷之三

文心雕龍補注

羅振玉題

內閣大庫藏書

林杉 著

文心雕龍批評論新詮

郭頌輝題



內蒙古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心雕龙批评论新诠/林杉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,
2001.

ISBN 7-5311-4295-3

I. 文... II. 林... III. 文心雕龙—文学研究 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4890 号

WEN XIN DIAO LONG PI PING LUN XIN QUAN

文心雕龙批评论新诠

林 杉 著

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西护城河巷 30 号)

邮编: 010010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0.25 字数 258 000 插页: 2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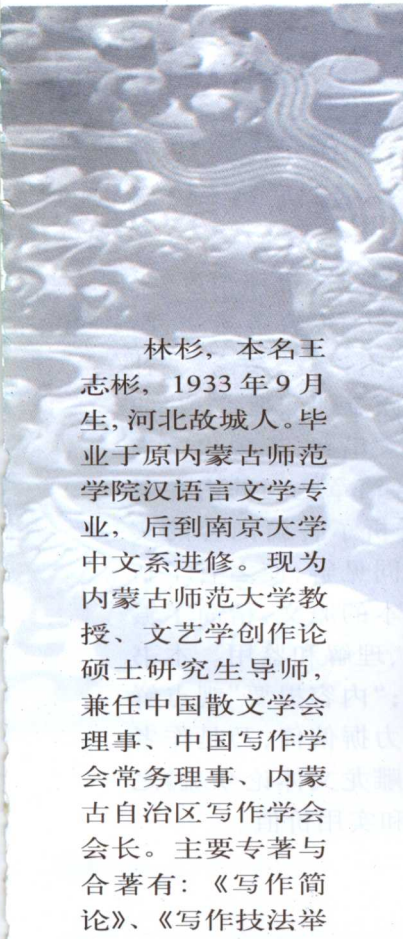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—1500 册

ISBN7-5311-4295-3/I·236 定价 (精装): 28.00 元

志足文信開新境
据古切時曉通變

欠心腔龍批評論為名家的第三部力作，志足文信開新境，已獲王變先生可貴的見解，甚不乖
時國其也，通古支批評論出版了，茲撰七言聯慶賀名家對龍學研究的又一貢獻。石運國批作書。





林杉，本名王志彬，1933年9月生，河北故城人。毕业于原内蒙古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，后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。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、文艺学创作论硕士研究生导师，兼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、中国写作学会常务理事、内蒙古自治区写作学会会长。主要专著与合著有：《写作简论》、《写作技法举要》、《修辞与写作》、《散文写作概说》、《中国写作理论辑评》、《中国写作理论史》、《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》、《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》等。



内容简介

本书立足于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和鉴赏、批评角度,采取“居今探古、见树见林”的态度和方法,综合各家之说,主要是对《文心雕龙》之“杂论”,或称“附论”、“余论”、“补论”部分(即通说之批评论部分),进行梳理和研究,并兼及其总论和文体论、创作论部分的有关篇章,表现出了三个主要特点:一是注重全书各部分、各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,使之前后呼应、左右相瞰;二是辨析了各篇内容的实践意义和主要歧疑,力图澄清各种不同见解,使之有了新的研究起点和高度;三是校正了各版本的原文,精简了辗转考训的繁复注释,使之更便于阅读、理解和鉴用。本书中的“原文译注”简明扼要,通俗易懂;“内容提要”观点鲜明,联系实际;“疑点辨析”立论有据,力摒偏倚,乃是作者继其《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》和《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》之后的系列之作,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实用价值。

例 言

一、本书是编著者继《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》和《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》之后的又一新作,综合反映了作者以写作指导为中心进行《文心雕龙》研究的整体状貌。其旨在辩证地吸取、借鉴《文心雕龙》批评论及其相关部分之精华,以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写作理论体系,提供必要的参证和依据。

二、本书以《文心雕龙》之“杂论”,或称“附论”、“余论”、“补论”部分(即通说之批评论部分)为主要研究对象,兼及总论和文体论、创作论部分的有关篇章,而在编排顺序上将其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编。上编以总论五篇统领全书;中编以批评论五篇为全书之主体;下编则以文体论和创作论部分的有关篇章为主体之参证。

三、本书所录《文心雕龙》有关篇章之原文,均以杨明照先生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和刘永济先生《文心雕龙校释》为据,并参考范文澜先生《文心雕龙注》、王利器先生《文心雕龙校证》,做了必要的修正,而不再加繁复的注释。

四、本书各章中之“原文译注”,采取分段句译方式,以便于读者释疑和理解;句译后之注释,均由编著者综合龙学各家之说,择其优善而从之,亦不再引经据典,详溯其源。

五、本书各章中之“内容提要”,均从鉴赏、批评的角度转向作者的写作修养与写作的原则和方法,而对与此无关紧要之枝蔓有所疏略。但阐述中力求忠实原著之要义,并前后相参以铨证之。

六、本书各章中之“疑点辨析”,主要是对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中之不同见解和容易混淆的问题辨正然否,献可替否;试图以实践作为

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,求得公允之论。所引观点,除注明者外,均出自后附之“参考书目”之中,为免繁复,均不再注其具体篇页。

序 一

邢乃让

我是个“半文盲”，粗识《文心雕龙》。不要说为一部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专著写序，即或要我全面读懂《文心雕龙》，恐怕也须三年寒窗！然而，林杉先生鼓励再三，说我也有优势——毕竟教过多年写作课，确知写作教学的甘苦和莘莘学子的心声。这倒也是实情。如果仅从写作教学的角度，谈一谈读书的心得体会，应该不是什么难题；倘若要求文必切题，还要具备科学性和理论性，说句实话，我可绝对做不到了。

《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》、《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》、《文心雕龙批评论新诠》，这三部书在世纪之交面世，其社会意义将是深远的。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历史总趋势，而电脑的普及与全球联网，必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为全球各民族带来不同文化的整合和认同。《文心雕龙》是经典、是国宝，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人类共同的！一部《孙子兵法》已在西方广为流传，《文心雕龙》也有望在世界不胫而走，使中国的写作理论和文学理论更加发扬光大！

话题转到国内，三部专著对广大热爱文学、热爱写作以及一般热爱读书的《文心雕龙》读者，都是一个福音。首先是文科专业学生，《文心雕龙》应是必读的经典之作。但因此书语意艰深，读懂实属不易。现经作者准确、通俗地注译，人人皆可读懂了，其乐如何？其次是一般读者，由于《文心雕龙》语多歧义，释家所见不同，令人莫衷一是。现经作者广采精辨，得出令人信服的公允之论，省力如

何?再其次,《文心雕龙》一向被视为文学理论批评专著,因而多被创作人员与写作爱好者忽略,现经作者辩证和研析,确认它是一部写作理论专著。以此为始,它对写作实践的积极影响,岂可轻忽估量?尤其值得关注的是:刘勰著《文心雕龙》,意在用大力纠正讹滥的形式主义文风。刘勰干预了文化生活!而林杉研治《文心雕龙》,也再三指出当今文坛,存在着类似刘勰那个时代曾有过的问題。林杉也在干预文化生活!但是,在中国现代历史上,文风问题历来是同党风和社会风气挂钩的。这一点,我们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反对党八股、狠抓文风一事上受到启发,也可以从邓小平、江泽民对精神文明的重视上窥见端倪。由此推论:林杉研治《文心雕龙》的积极效应,将会超越文坛带有广泛的社会性。

研治《文心雕龙》或别的文献古籍,无论任何人都要面对一个难题——继承与发展的问題。继承是发展的前提,发展是继承的目的。道理十分简单,操作却远非易事。难就难在继承多少,这个“度”很难把握。为了不至于误入“雷区”,担一个为封建王朝歌功颂德(效力卖命)的罪名,最好是抽象肯定,空喊继承,而千万不能拿出实货。然而,没有昨天何来今天,没有继承,发展也成了空话。翻过这一页心痛的历史,就应当柳暗花明又一村了,却由于历史情性,思想还是冲不破牢笼。在古籍文献的研究领域,平庸之作绝不少见,其原因就在于不敢突破和心有余悸!在这里,林杉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胆识。他对继承文化遗产的态度,是真诚的、积极的、豁达的。其一,他倡导“亦是亦非(亦此亦彼)说”,用以修正和补充“非是即非(非此即彼)说”。他指出:“非是即非”与“非此即彼”的学者和学说,确实是有的,不能一概否定。“但在千秋百代、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,也每有‘亦此亦彼’、‘亦是亦非’的学者和学说,对他们的评价为什么非要给一个‘非此即彼’、‘非是即非’的结论呢?”“亦是亦非(亦此亦彼)说”是一个哲学命题,不但符合历史事实,也符合两点论、辩证法;“非是即非”(非此即彼)却把事物看死

了,绝对化了。林杉的倡导至少可为蒙冤的历史人物(历史论著)和历史事件(观点语录)一洗冤情,是有利于文化遗产的继承的。其二,他提出“名亡理存说”。林杉认为:在刘勰的“论文叙笔”中,有些文体是古老而又年轻的,具有新的生命力,继承和发扬这些文体的精华自然不在话下,而“即使那些被历史淘汰了的曾专用于封建统治的文体,诸如诏策、奏启、章表、封禅等等,也有名亡而理存的情况。刘勰从中概括出来的某些写作原则、要求、方法和特色,对于今之有关各体文章的写作,也并非毫不相干”。他并且做了举例证明。这里的“名亡理存说”,比起前面的“亦是亦非(亦此亦彼)说”更进了一步,堪称是起死回生之术,是继承历史遗产的一个“绝招”,实在好极了。其三,他主张品行价值说。在谈到刘勰的征圣、宗经、崇拜孔丘和儒家经典的问题时,林杉首先问道:否定了刘勰的这一切,“那又让他征什么、宗什么、崇拜什么人和什么家呢?他又将何以论文呢?”接着他笔锋一转写道:“其实,当代文家固然无需去‘征’刘勰崇拜之‘圣’,‘宗’刘勰信奉之‘经’,但弃其具体内涵,取其心核,仅从刘勰征圣、宗经的那份虔诚、那份执著、那份坚定、那份朴素的辩证意识和思维方法来看,当今的为学之人,不是也应该获得一些启发,而有所思考吗?”讨论继承问题,达到这种境界,还要求别的余地吗?以上三项主张,本为林杉研治《文心雕龙》专用,其实大可推而广之,作为继承与发展的一般原则。

在研治《文心雕龙》的三部专著之中,林杉用“创作论”打头,标志着“创作论”才是他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。林杉挚爱文学创作,并曾因此招来过舆论压力,被指斥为专业思想不巩固、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膨胀,等等。林杉却认为:语文教学和文学创作是能够互补的,是可以相得益彰的。林杉执著于自己的追求,是林杉终于找到《文心雕龙》而精研有成的原因;反之,《文心雕龙》“创作论”的主旨得以弘扬,又是以林杉的艰辛劳动做基石的。假如林杉早年放弃了自己的追求,便没有今日三部著作的问世。独立思考对于

一个学者太重要了,而从众和随俗,则一定是学术思想的死亡!在三部专著的各篇章中,每一篇的“内容提要”都以立论准确、文笔简要见长,作者的科学态度是可以感知的。但是相比之下,我尤喜诵读“疑点辨析”。在这里,作者“弥纶群言”,总是先肯定人家长处,尊重人家的研究成果,然后进行分析比较,得出一个公允的结论。给人以至亲好友、济济一堂、喜庆饭宴、其乐融融的感觉。它与党八股干枯死硬,帮八股剑拔弩张的腔调形成极大反差。当然,这对林杉来说,是“惟务折中”学术思想的体现;但依我的观察,则是他宽厚待人精神的折射。林杉重反思、能容人。每当他回顾往昔的人情世态时,总是严于责己、宽以待人的。谈起十年浩劫,他就说:“极左思想我们没有吗?”这一问确实有理,令人难以回避。但是,凡属学术上的是非之争,他又是极为严谨、审慎而不苟同的。如对《知音篇》中关于位体、置辞、通变、奇正、事义、官商等“六观”说,有人认为这是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,林杉却断然否定这种意见,并举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提出普遍永恒标准的朗吉弩斯为例,指出“六观”不具备判别作品优劣的明确规定性,只有《宗经》篇提出的“六义”(情深而不诡、风清而不杂、事信而不诞、义贞而不回、体约而不芜、文丽而不淫),才具有鉴别优劣美丑的规定性,“六观”则不过是分析作品优劣的方法。真理总是赤裸裸的,不需要扭扭捏捏、羞羞答答地作态!在这里,论点是周延的,论据是充足的,论证的过程犹如夺关斩将,一路凯旋。林杉的文风我喜欢!

三部专著原是其作者的教学提纲,是为教学的需要编写的,因而它对教学的意义值得关注。林杉的敬业精神很强,对教材的要求很高,不断地充实,改了又改,永无止境。20世纪70年代末,他与郝季光所著《写作简论》问世以后,迄今他已先后出版了《写作技法举要》、《修辞与写作》、《散文写作概说》、《中国写作理论辑评》、《中国写作理论史》等专著与合著,无例外地都是语文专业的教材与教学参考书。林杉以教师的身份著书立说,从没有超越教学领

域一步,而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。八九十年代,全国在写作教材的建设上有了新的突破:“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”、“幼苗已成长为合抱之木”。安于现状似乎也说得过去了,而林杉眼中所看到的画面却是:“白天鹅”羽毛不丰,“合抱之木”是没有根的。堂堂的文章大国却只有文章而罕有写作理论,这正常吗?林杉有感于此,自觉地做了执著的寻根者。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,这条根终于被他找到了。

《文心雕龙》这部典籍,经过林杉辛勤劳作,剔除了不科学成分,辨析了不准确的内涵,终于现代化了,渐渐被鉴用到写作教材和写作教学之中去了。当然,推陈出新不能一蹴而就,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,是永远不会止息的。那么,三部论著对教学的意义究竟如何呢?一位离休老教师说:“三部《文心雕龙》专著,对写作教学意义太深远了。我作为这门学科的教师,确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绝对相信,精读这三部论著,定能使写作教学的面貌大大改观!”

林杉先生著作甚丰:专著合著之外,如将他主持编撰、协同编撰的书刊包括在内,约有数百万言。加上学术品位和社会意义都令人瞩目的三部《文心雕龙》专著,说他是功成名遂亦不为过誉!然而,林杉的成就绝不是名利思想驱动的结果,因为追名逐利的个人主义者,多数是急功近利而又不甘于冷落的。做学问要坐冷板凳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与刘勰为伴,会把青春磨光、机会误过的。更何况搭进去的辛苦,未必得到有偿回报,颗粒无收的荒歉之年总是会有的。假如林杉真不安心于教师职业,他也完全有机会调转一个工作。而今他在教师岗位上,兢兢业业40余年,培育了一批批人才,而经他带出的新生代骨干教师,无论学术水平或教学质量,都是令人刮目的。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:他的专业思想坚如磐石吗?一个人的事业有成,是少不得几分傻劲的。林杉以自己的生,填充少年壮志,是精还是傻呢?留给世人评说吧!

试以为序。

序 二

侯 攀 峰

继《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》、《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》之后，吾师志彬先生的又一部“龙学”新著《文心雕龙批评论新论》问世。我有幸先睹为快，并为之写序。

先生有言：写作教学需要“志愿兵”，写作理论研究更需要“志愿兵”，先生自己正是一个锲而不舍、“咬定青山不松口”的“志愿兵”。为了教学、科研，先生数十年如一日，潜心于《文心雕龙》研究。先后发表《文心雕龙性质问题述评》、《刘勰养气说新探》、《刘勰“论文叙笔”今辨》等多篇论文，相继完成了《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》、《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》两部专著。而《文心雕龙批评论新论》的问世，可谓是对《疏鉴》、《今疏》的“补充”和“拓展”。

拜读先生的新著，不仅为先生精到的见解浸染，更为先生的治学之道叹服。这里，恕我将先生所教导的治学“十六字诀”视为先生新著的四大特点。

“弥纶群言”。先生对书中研讨的每一个问题，总是全方位地认识其每一个侧面，将前人所做出的局部、个别、微观的研究进行综合概括。如《辨骚》篇中，先生在辨析“作为楚辞之代表的一种具体文体，为什么不置于‘论文叙笔’部分，而把它提升到‘文之枢纽’中去，视之为论文的指导思想”时，遍举了段熙仲、王元化、王运熙、钟子翱、黄安祯、王更生、刘永济、张志岳、张长青、张会恩等“龙学”专家的见解。这样，就使原本孤立存在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，形

成了一个整体的、集中的、内涵更为丰富的范畴,为自己展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“钩深取极”。先生治学,总是在充分掌握了前人对某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后,进一步分析、思考,达到前人所未达到的深处和细部。如《序志》篇中,先生在辨析《文心雕龙》一书的本体性质时,便是先摆出前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,列举了和先生想法大体一致的有代表性的意见。在此基础上,辨析古今“文学”概念的异同,《文心雕龙》和现代文学理论的相同和相异之处,最后从《文心雕龙》的根本宗旨、基本内容和结构等方面着眼,层层深入,令人信服地证明了《文心雕龙》“篇篇不离‘为文之用心’这个宗旨,既提出了写作的指导思想,又论述了各种文章写作的规格和要求,原则和方法;既阐述了写作的客观条件,又强调了写作的主观因素”,“是一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典型的写作理论专著”,从而收到了钻坚求通的效果。

“辨正然否”。先生治学善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甄别、验证,提出质疑,分清是非。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全书各篇的“疑点辨析”部分。譬如关于《知音》篇的性质问题,有人视为鉴赏论,有人看做批评论,也有人时而言其批评论,时而言其鉴赏论,可谓众说纷纭。先生把刘勰的世界观与其文学观、文章观结合起来,把写作、鉴赏、批评联系起来进行辨析,认为在《知音》篇研究中,固然可以从不同角度着眼、入手或则批评论,或则鉴赏论,但若从严格意义上准确判定其性质,则以两者相提并论为上。这样便克服了片面性,使之与实际相符了。又如在《诠赋》篇中辨析“赋”的概念时,先生列举“赋”的三种含义,内征外引,逐一进行甄别、考证,指出“赋”作为一个概念,有着不同的含义:一是指《诗经》中的一种表现方法;二是指一种创作活动;三是指借朗诵诗章来表达情志和意向的一种方式。它们之间既有联系,也有区别。最后得出“刘勰在《诠赋》篇中虽然涉及到上面的三种含义,但都不是该篇的宗旨。

刘勰所论之‘赋’，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”的结论。这样，既澄清了各种不同的见解，又分清的是非，使之有了新的研究起点和高度。

“独抒己见”。先生治学能够提出异乎前人的独到见解。就连篇目的编排，也是独树一帜，既不受原著的束缚，也不重蹈其他“龙学”研究者的覆辙，而是着眼于原著内容的相互联系，将全书所涉及的鉴赏论和批评论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编。上编包括《原道》等五篇，作为进行写作实践和鉴赏、批评的指导思想；中编包括《时序》等五篇，作为本书的主体；下编包括《明诗》等七篇，作为本书主体部分的参照。这样的调整和论述，体现了先生对《文心雕龙》全书各个部分的透彻理解和超群胆识。又如先生辨析“刘勰论文以征圣、宗经为标准，盲目地崇拜孔丘和儒家经典”，“对当代文学已失掉了指导作用”的批评意见时，观点鲜明地指出：“对刘勰的征圣、宗经，崇拜孔丘和儒家经典，要做具体分析，有什么缺陷，就批评什么缺陷，而不宜笼统地视征圣、宗经为局限”，说它“对当代文学已失掉了指导作用”。告诫当今的为学之人，应取其“心核”，从中获得一些启发，引起一些思考。明白“做学问、著书立说，是不能没有自己的信念和指导思想的”道理。如此客观、深入、独到的见解，非积之甚久、屡验不爽者是难得其要义的。

此外，求真务实也是先生新著的一大特点。先生的求真务实，首先表现在治学思想上，先生为文治学，从不为学术而学术，而是紧密联系写作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实际，将自己对“龙学”的研习所得和研究成果，鉴用于其参编、主编、合著和独自撰写的十多部写作学著作中，不仅提高了“龙学”研究的现实意义，而且充实、深化了现代写作理论内容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写作理论新体系，提供了借鉴和依据。

其次是表现在对原著评价的客观、公允、中肯上。先生治学，历来反对片面性、绝对化的思维。认为“非此即彼”、“非是即非”的学者和学说，确实是有的，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，也每有“亦